

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湖南自古被称为“屈贾之乡”。这一称谓是同屈原、贾谊的忧乐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屈贾忧乐精神构成“屈贾之乡”的精魂和核心要义。屈贾忧乐精神锻造了湖湘伦理文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骨,也为中华伦理文化注入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品质和民族精神。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砥砺中国品质,培育中华德操,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意识和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屈贾忧乐精神;湖湘文化;中华伦理精神

中图分类号:B22;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6-0043-09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①,屈原和贾谊先后于战国时期和汉初流放于湖湘大地,并在此地创作出了一系列忧国忧民的诗作和文章,使湖湘大地成为他们忧乐精神的繁衍、传播和传承之地,也因此锻造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血脉和气质风骨,使得湖湘大地被称之为“屈贾之乡”。两千多年来,湖湘大地因传承和弘扬屈贾忧乐精神而发展起一种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坚执的担当品质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湖湘文化,并在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大潮中谱写出一幕幕气吞山河的辉煌史诗。

一、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

屈原和贾谊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和汉初中华民族忧乐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将对“道”的忧乐情怀与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忧乐联系起来,表达出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并乐此不疲地求索国家强盛和民

生富庶之道,希冀用自己对于美政善治的理想型设计为自己所属的国家做出贡献。特别是在其治政主张不被见用而遭放逐的困难情境下,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系梦牵的国家民族,其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的忠贞情愫天心可鉴。屈贾忧乐精神的实质是忧国忧民以及对美政善治之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都怀着经邦济世的宏大理想,并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形成一种为理想和信念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和顽强品格。他们精神上感觉到的快乐是美政善治的理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所生发的忧虑忧患则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状况的不尽忧思和高度关注,本质上是对道义追求和与道为一的快乐以及对道义沉沦、道义不彰的忧虑,体现出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价值眷注和家国情怀。

屈贾忧乐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境界高远的精神和价值体系,由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

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007)。

作者简介:王泽应,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之心、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对庶民百姓的关注忧思之情、对美善人格的倾慕拱立之节以及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所构成。

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屈原、贾谊心志中所表达出来的忠诚不仅指对国君的忠诚(或曰私忠),而且大量地集注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忠诚(即公忠),并且这种对国家民族的绝对忠诚即使在他们个人命运遭遇种种苦难与打压的情况下也充满着“痴心不改”的精神特质。此即如屈原所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证。”(《惜诵》)他们那种“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的精神是士大夫忠于国家社稷之公忠精神的集中体现。屈原一生忠心为国,把报效国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了振兴楚国,他胼手胝足,鞠躬尽瘁,从事实现“美政”的革新活动。屈原“忠而见谤”,两次被放逐到湖南沅湘一带,因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离骚》虽然不时吐露出屈原心里的种种怨艾,然而这种怨艾不是对个体生存发展状况和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的愤愤不平,而是对“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而“谗人间之”的忧伤和忧思,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离骚》开篇言明自己与楚王“同源共本,世为宗臣”的身份,表明他“有不能传舍其国、行路其君之意”。这种“不能传舍其国”的精神,实质是屈原心系楚国前途命运,冀望其强大振兴和“恐皇御之败绩”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于楚国的存亡、对于存君兴国有着一份责无旁贷的担当或义不容辞的责任。屈原的“美政”是以尧、舜、禹、汤、文王、楚之三后、齐桓、晋文等时期的政治清明为标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汤禹俨而祇敬兮,周道论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何独乐斯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屈原内心

深处充满着对楚国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并衷心而热切地希望楚国强盛一统天下。在当时列国争雄的情境下,他渴望以自己献身国朝美政的实践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满含深情地劝告楚王珍惜年华,改变因循守旧的态度,振兴楚国。“不抚壮而弃秽兮……来吾导夫先路。”他列举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事例,表示自己不畏艰难,要帮助楚王重振楚国,恢复到前王的那种盛世局面。“岂余身之惮殃兮……及前王之踵武。”但是,屈原的赤胆忠心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反倒招来了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小人嫉恨他:“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王也听信谗言,不再信任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齎怒。”尽管如此,屈原还是不改初衷,不愿意放弃自己对楚国的忠诚。《离骚》有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指天发誓,表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离骚》又云:“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就是说,自己即使肢体分解也不会更改,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他用“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来表达自己的故土故国坚定不移的忠爱之心。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指出:《离骚》兼《国风》“好色而不淫”和《小雅》“怨诽而不乱”于一体,有着“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的独特意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离骚》及其他楚辞各篇中,屈原表达了自己忠于楚国绝不改变的爱国赤情。

贾谊亦有着如同屈原一样的忠国之心。他在《新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历史和朝廷政权建构的实际状况,认为当时的分封制有可能削弱中央政权。在他看来,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只要他们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就必然会反叛中央政权,其规律是“大抵强者先反”,故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的强化中央集权制的主张。究其依据,则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

小则无邪心”(《藩强》)。贾谊所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是他对汉初政治状况深刻分析后得出的治政之策,从后来景帝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梁王反叛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只是当时文帝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再加至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敖、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竞相诋毁贾谊,认为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致使贾谊受到文帝的疏远,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谊对朝廷一腔忠诚却反遭此厄运,心中自然难以平静。他在过湘江时专门写有《吊屈原赋》,开头便将自己与屈原联系起来:“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其意是说,我恭奉天子诏命,带罪来到长沙任职,曾听说屈原自沉汨罗江而长逝,今天来到湘江边上,托江水来敬吊屈原英灵。接着,贾谊结合自己的遭遇而论屈原所遭遇的无情迫害和人生厄运,指出屈原正是因忠而见谤,赤胆忠心遭遇人生横祸,才逼得他自杀失去生命。“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贾谊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公忠精神,对屈原公忠体国、九死不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充分肯定,表达了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坚强决心和高尚情怀。

其二是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屈原、贾谊之所以有那样深刻的忧患意识、悲悯精神,不是他们个人秉性与生俱来的偏好甚或家族遗传,而是来自他们在求真理求正义征程中所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及对崇高理想信念的拳拳服膺之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征的是屈原孜孜以求真理和道义的心曲。作为高阳帝之苗裔,屈原为自己的出身骄傲,但更重视自己的内美,修身立德,志存高远。他尤以圣贤为师,重“内美”、重才能、重“修名”,抱着“有德在位”“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强国富民”等“美政”理想,竭忠尽智,以身殉道,“九死不悔”。屈原的这种美政理想来源其对自身人格的认同上。《离骚》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

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里所展示的是一个身世高贵、品德高洁、才华出众的自我形象,言辞之间充满了自信。屈原在《离骚》中言说自己“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是认为自己既有内在美好的道德品质,又重视后天德能的修饰和培养。屈原一生都在努力追求政治清明、公平正义的美政理想,并对政治清廉、人格独立完善予以由衷礼赞。故曰:“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离骚》结尾处写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其意是说,既然无人能同我一起实现那美好的政治理想,那么,我就要向古代的贤人彭咸学习,宁死也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则明确地表示他没有办法做到。贾谊也在自己的从政生涯中不断上下求索,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化解政治生活危机、如何使政权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政方案和治政智慧。深读《治安策》,会发现其中有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精识睿智,也能感受到贾谊的忧国忧民之高远思慧。

其三是对庶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无比忧思和高度关注之情。屈贾忧乐精神有着对庶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深深同情。屈原主张关注民生,对百姓生活的艰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抽思》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些诗句,反映了屈原关心民生疾苦、以民为重的思想,是其爱民意识、忧民情怀的生动展现。屈原的“美政”理想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屈原在《离骚》

《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讲到“民”的问题。“哀民生之多艰”“相观民之计极”(《离骚》)，“览民尤以自镇”(《九章》)。在屈原看来，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体察民生的艰辛，要以观察百姓的疾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尽力想办法去解决百姓的苦难。他一心向民，建议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在屈原身上，“爱人民”“爱国”“爱真理和正义”三者得到了高度统一。他用体恤民众的良知和不卑不亢的操守将忧国、忧民和忧道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忧乐精神变得十分丰满。贾谊继承了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思想传统，始终把民生疾苦装在心里，要求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在《治安策》《过秦论》等文中亦有对如何减轻百姓负担使其能够休养生息的精湛论述。贾谊在《论积贮疏》中针对汉初民不聊生的现状，以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提出论积贮的主张，凸显出其忧国忧民意识。该疏以管子“仓廩实而知礼节”开篇，直指民生问题。他指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更进一步指出了粮食富足对于庶民百姓的重要性。针对当时百姓“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的生活状况，贾谊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观点。贾谊请求当权者不要“背本而趋末”，而要体恤民生，关心民生，“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以达到“畜积足而人乐其所”。

其四是对美善人格的倾慕向往和矢志护卫之节。屈原以香草自喻，并把自然香草与人品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用采集、佩服、种植、怜惜等词抒发对香草的倾心。“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不仅以香草自喻，而且以香草树木喻人，形容自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里的“江离”“辟芷”“秋兰”皆香草也，旨在以香草譬喻美好的道德修养。屈原的人

格修善，不是远污秽避浊世，而是以“鸷鸟不群”“方圆不周”的姿态，公开把自己置于与群党众小对立冲突的格局中，不但自身出污泥而不染，而且表现得愤世疾俗，疾恶如仇，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屈原是一个道德修养上的完美主义者，他努力追求的是人格上的尽善尽美。屈原洁身自爱，独清独醒，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他志洁行廉，矫然自异，从不随波逐流；他不妖不染，皜然不滓，决不同流合污。其高洁人格堪“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在屈原眼里，放弃人格的历练和精神的追求无异于自我毁灭，他“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怀沙》)。这种执着地守人格之清、全人格之节的举止与修为彰显了屈原精神气节的高岸和伟大。贾谊也有对美善人格的真诚倾慕和不懈追求，并以美善人格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史诗。

其五是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屈原和贾谊有着对伦理文明价值建构的深度思考，对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的苦苦寻求，并因此而形成高瞻远瞩的伦理智慧。屈原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不仅在《离骚》中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而且在《橘颂》中也借助橘树的品格作出了既“受命不迁”又“横而不流”的描述，揭示出伦理文明必须像橘树那样既扎根泥土又花繁果实的生存论品质。“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脩，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树秉受天地之气，志向专一、品质优良，生来就扎根于南方，深深地挚爱着这一方热土，不可迁徙。它不仅外表色彩艳丽、果实饱满，而且内心纯洁、绝无杂质。尽管它枝叶繁茂，但层次分

明、形象美好、气质超群。橘树自幼就抱定“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长大后更有“横而不流”的高风亮节。它不媚凡俗,无所希求,头脑清醒,特立独行,令人倾慕;内善外美不偏不邪,特立独行坚贞挺拔。在深深热爱自己故国乡土的屈原眼里,橘树“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秉性,正可与自己矢志不渝的爱国情志相吻合,也砥砺着他秉持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德操。这种伦理智慧把目光集聚于现在和未来,强调以务实之举应对现实问题,使其朝着光明美好的方向迈进,充溢着一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伦理精神。

二、屈贾忧乐精神对湖湘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屈贾忧乐精神生发和传延于湖湘大地,培育陶钧着湖湘儿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卓励敢死”的伦理禀赋,也成为湖湘伦理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湖湘大地因生发和传延屈贾忧乐精神而被称为“屈贾之乡”。“屈贾之乡”是与屈原、贾谊忧国忧民精神的生发、传播、绵延与弘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屈贾忧乐精神犹如一道精神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亦如文化基因在文化递嬗和社会演化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生成一种一以贯之的伦理气质、源远流长的伦理精神。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后不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②,“其行义”者,爱国也。正所谓“楚人悲屈原,千载尤未歇”^③。楚国人民本来就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和悠久的爱国传统,屈原的精神与作品,自然能引起楚人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楚人纷纷纪念他,吃粽子,划龙舟……并以他为榜样,热爱祖国,抵抗强秦。楚国被秦国灭掉后,民间流传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屈原诗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斗争意志。历史地考察,屈贾忧乐精神陶熔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也是形成湖湘文化价值特

质和精神禀赋的伦理始基和本源。“屈贾流风泽备三湘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潇湘士子”^④,奔流动荡的历史变幻、此消彼长的政治纷争,都无法止息这种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的代际传衍和生生不息。

东汉时期著名楚辞学家、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指出:“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基于对屈原高尚人格与爱国气节的高度认同,他醉心于屈赋的整理与研究,把刘向编订的屈原25篇作品逐字逐句作注,以经求理,从而使屈赋及其精神气节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北宋时期,范仲淹应岳州太守滕子京之请而作的《岳阳楼记》进一步凸显并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范仲淹虽然没有到过湖湘大地,但是对湖湘大地生发和传延的屈贾忧乐精神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岳阳楼记》继承并光大了屈原和贾谊的爱国忧思,而其所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能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⑤的价值观念和忧乐情怀则成为湖湘文化历史的坐标和涌动的潮流,将屈贾忧乐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南宋时,屈贾忧乐精神在朱熹的理学阐释中再次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抗金救亡的精神旗帜。任过长沙太守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表彰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认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⑥屈原因为忠君爱国使他在“大节”上无可挑剔,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离骚》以“美人”“灵修”寄意于君,或“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或“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自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己耳”,委婉而坚定地表明了屈原对君主的忠诚和依恋。《九歌》是放逐之后,

见到民间祀神歌舞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九章》是“既放”而“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之作。朱熹将屈原之忠君与爱国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凸显了屈原忠君爱国的诚心及其精神价值，对于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之际，当天崩地解之时，一代大师王夫之在湖湘大地探寻社会变故之理，寻找民族复兴之道，写下诸多宏文高论，寄托了“寒梅春在野塘边”的理想。王夫之自称“生于屈子之乡”，以“旌三闾之志”^⑦，亦即以发扬屈原的精神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船山认为，屈原精神的核心是忠，即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也包含对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的忠。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船山指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⑧他称颂屈原为“千古独绝之忠”。^⑨在《离骚经》的题解和尾注中，船山对朱熹指责屈原“忠而过”的观点不以为然，指出：“君子从容就义，固非慷慨轻生、奋不顾身之气矜决裂者所得与也。审乎进退者裕而志必伸，原之忠，岂忠而过乎。”^⑩王船山通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王夫之“埋心不死留春色”，“孤忠独抱”，其船山顽石之志是对屈贾忧乐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中国，命运坎坷，国家多难。湖湘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仁人志士。魏源自幼受到屈原精神的影响，青年时代就十分关注国计民生，曾在自家厅堂柱子上题写楹联“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以表明自己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魏源对国家民族怀有深刻的忠诚和忧患意识：“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⑪魏源《送李希莲归郴州》有诗句“我有苍茫万古愁，欲起灵均诉澧芷”，将屈原引为千古同调、精神导师，所言“灵均”即屈原之字，“澧芷”指澧水的芷草，系屈原诗歌中称颂

的对象。曾国藩将湖湘士大夫精神追溯至屈原、贾谊，指出：“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⑫左宗棠早年慨然有天下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在新疆寇深祸急之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64岁高龄毅然抬棺西征，收复失地160万平方公里，挫败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郭嵩焘十分崇敬屈原。在他创办并主持的“思贤讲舍”，崇拜四位湖南历史上的先贤，而屈原排第一，其他三位分别为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1891年郭氏逝世，严复送挽联一幅：“平生蒙国土之知，而今鹤翅氤氲，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啄，离忧岂仅屈灵均？”在这里，严复以屈原与郭嵩焘作古今对照，认为郭嵩焘承继并弘扬了屈原的忧患意识。

在“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关头，屈贾忧乐精神的传人谭嗣同发出了“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豪迈呼声，以慷慨激越的爱国举动实践舍我其谁的责任。1885年冬天，时当弱冠之年的谭嗣同从浏阳再赴甘肃兰州其父谭继洵的任所，途经陕西省商洛县之“武关”。谭嗣同触景生情，抚今追昔，作有《武关七绝》一首：“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⑬“湘中旧词客”即指屈原，而“我亦”一词表达的则是谭嗣同以屈原的继承者自许自励。1887年，谭嗣同又写了一首《画兰》诗盛赞屈原的精神操守：“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簾起暮涛。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⑭1888年，谭嗣同作《洞庭夜泊》一诗：“船向镜中泊，水于天外浮。湖光千顷月，雁影一绳秋。帝子遗清泪，湘累赋远游。汀洲芳草歇，何处赋离忧？”^⑮船泊洞庭，谭嗣同心灵深处念念不忘的仍是屈原的远游和离忧。1890年春三月，谭嗣同在浏阳作《湘痕词八篇并叙》悼念他的亡母及早逝的兄姐，在诗前的小序中，谭嗣同写道：“生

于骚国,流连往躅,水绝山崩,靡可拟似。”^⑩屈原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谭嗣同心中播下了种子,激励着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竭诚奋斗。他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艰苦的创造与探索,更从实践上身体力行,为变法壮烈牺牲,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其凛然正气融进民族伦理精神的深处,化为近代救亡图存的不尽血脉。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指出:湖南文化“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⑪钱基博认为屈原是“万流景仰”的“人伦楷模”,屈原的精神影响早已超越了一乡一邑,具有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风化效应。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深受屈贾忧乐精神的影响。他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时常品读屈原、贾谊的著作,推崇《楚辞》,酷爱《离骚》,并对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很感兴趣,对屈贾忧乐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为屈原、贾谊的忧国忧民之精神所感动。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作的《讲堂录》共47页,前一页抄录的是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在毛泽东眼里,屈原、贾谊都是年少就有鸿鹄之志,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才干。毛泽东与当时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孜孜不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自青年至晚年都深深地喜爱屈贾精神及风骨,有诗人称颂“毛泽东诗词动天下,屈大夫辞章开楚风”,可谓一语中的。1949年

12月6日在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是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⑫1951年12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聚谈,多次谈到屈原的《离骚》,认为《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⑬不久,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他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先学《离骚》。”^⑭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这首诗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他。60年代,毛泽东还写了两首咏贾谊的诗作,称颂“贾生才调世无伦”,“少年倜傥廊庙才”,对贾谊的诗才和智慧予以肯定。贾谊从长沙回长安后向文帝所上的《治安策》可谓忧时警世的爱国主义名作。毛泽东指出:“《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⑮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屈原、贾谊忧乐精神的肯定和称颂,也说明屈贾忧乐精神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屈贾忧乐精神的时代价值

屈贾忧乐精神因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理想信念的孜孜以求以及对高尚人格的倾慕而有其不朽的精神价值。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告别了积贫积弱和遭受欺凌的屈辱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但是,诚如习近平所说,越是取得伟大成

就,就越需要忧患意识和忧乐精神,我们必须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②只有始终不渝地弘扬忧患意识,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做到居安思危,才能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党不断焕发出青春朝气和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多次引用屈原的诗句来强化新时期弘扬忧患意识的重要性。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屈原《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诗句赞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不屈的先烈们,充分表达出对那些在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的先烈们的敬仰与怀念之情。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引用了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认为屈原因为民生艰难而叹息流泪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2016年“七一”前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言,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

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忘初心,发扬先进性,保持纯粹性,永葆自身的朝气与活力,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在党言党忧党,永远注目于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我们党“存而不忘亡”,永远忧勤惕励,始终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始终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努力去应对市场经济的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能力不足的考验和精神萎靡的考验,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国家尽管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是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不少,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式来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我们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 and 攻坚期,真可谓“船到江心浪更急,人到山中路更陡”,必须保持不进则退、非进不可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更是一场等不起、拖不得的攻坚战。如何精准扶贫,真正增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应对解决。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份“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改革的定力和活力,不回避困难,不惧怕问题,勇于担当,勇于开拓,如此才能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风险系数不断加大,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特别是面临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形势,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竞相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一带一路债务陷阱”等,试图搅乱人心,混淆视听,阻止甚至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意识,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观念,并在实际生活中敢于担当,敢于奉献,化危为机,化干戈为玉帛,变腐朽为神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发展好、利用好全球化信息化的便利,又防范它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对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 ①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参阅《诗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 ②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 ③苏轼:《屈原塔》。原诗为: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苏轼睥睨天下诸多文人,而独对屈原十分敬慕,并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
- ④陈书良主编:《湘学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页。
- ⑤范仲淹:《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169页。
- ⑥朱熹:《楚辞后语·反离骚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 ⑦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昭》,《船山遗书》(第十五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125页。
- ⑧王夫之:《楚辞通释·序列》,《船山遗书》(第十五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7页。
- ⑨王夫之:《楚辞通释·离骚经》,《船山遗书》(第十五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10页。
- ⑩王夫之:《楚辞通释·离骚经》,《船山遗书》(第十五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24页。
- ⑪魏源:《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08页。
- ⑫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9页。
- ⑬谭嗣同:《武关七绝》,见《谭嗣同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 ⑭谭嗣同:《画兰》,见《谭嗣同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 ⑮谭嗣同:《洞庭夜泊》,见《谭嗣同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 ⑯谭嗣同:《湘痕词八篇并序》,见《谭嗣同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 ⑰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 ⑱⑲⑳《诗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2、112页。
- ㉑《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97页。
- ㉒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责任编辑 李有梁]

Essential Connotation and Era Value of Qu Yuan and Jia Yi's Happiness and Anxiety Spirit

WANG Zeying

(Research Center of Mor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Hunan has been called "the hometown of Qu Yuan and Jia Yi" since ancient times. This tit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Qu Yuan and Jia Yi's spirit of sorrow and patriotism, or the spirit of Qu and Jia's sorrow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the home of Qu and Jia". The spirit of Qu and Jia's sorrow and joy casts the excellent quality and spiritual spirit of Hunan's ethical culture, and also injects an ethical and national spirit for the Chinese ethical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Qu and Jia's sorrow and jo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us to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spirit, to cherish the quality of China, to cultivate Chinese ethics, and to enhance the ethic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Qu Jia's spirit of sorrow and joy; Hunan culture; Chinese ethical spirit